

抗日战争时期赣闽粤边区的 第一次现代化浪潮

温 锐 游海华

内容提要 赣闽粤边区向来远离江西、福建、广东三省政治与经济中心,是为三省政治的边缘化地区和社会经济的贫困地区。19世纪末20世纪初,边区开始了缓慢的现代化的进程。抗战军兴,东南各省军政机关、工商企业、学校、避战逃难人员等纷迁赣闽粤边区,给赣闽粤三地区社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长期处于区域政治边缘化的边区迎来了第一次现代化浪潮。

关键词 抗日战争时期 赣闽粤边区 现代化浪潮

赣闽粤边区是指福建的闽西、广东的粤北和江西的赣南三省毗邻地区,境内纵贯着武夷山脉和横亘着九连山脉;由于崇山峻岭、山体宽厚、交通不便,向来远离三省政治与经济中心,是三省政治的边缘化地区和社会经济的后发地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东南的浙、闽、粤、赣四省主要军政机关纷迁武夷山麓^①,形成了中

① 浙江省政府于1937年9月后,先后迁入浙西之金华、永康,最后迁到浙南山区云和县;1938年5月,福建省政府和保安处内迁闽西北之永安县;同年10月,广东省政府、国民党省党部和第四战区司令部北迁粤北之曲江、连县,后广东省政府又于1944年东迁龙川县,1945年再迁平远县;江西省政府则于1939年3月南迁赣西南之泰和县,1944年底东迁赣南之宁都县;第三战区长官部和政治部则一直驻扎在赣东北的上饶县,1942年浙赣战役中,一度撤迁闽北建阳。分别参见政协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第165页;政协福建省上杭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室编:《上杭文史资料》总第8期,第38页;福建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福建文史资料》,第5辑,第50页;政协梅州市文史委员会编:《梅州文史》第3辑,第144-145页;政协江西省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江西文史资料》总第16辑,第166、169、152、162-163页。

国东南抗日大后方。地处武夷山中南段和与南岭九连山脉相交的赣闽粤三边地区,便凭借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和特殊的地理区位,首次改变了三省政治经济边缘化的困境,成为赣闽粤三省政治经济中心与东南抗日大后方的腹地。她接纳了闽、粤、赣三省军政机关、劳力、学校、新兴产业等各项资源和当时先进生产力的内迁,在国民政府大力恢复和加强对边区人民的控制与管理的同时,该地区也迎来了第一次现代化浪潮。

一 现代交通通讯网络的初步形成

清末民初以前,赣闽粤边区已经有了由水路和古陆道组成的传统交通运输与通信网络。水路运输干道主要有闽西的汀江水系、粤东北的梅(江)韩(江)水系和东江水系、赣东南的贡水水系;陆路主要有跨越武夷山脉和九连山脉的十几条省际山路。^① 这些省际山路把前述水系连为一体,组成了赣闽粤边区基本完整通达的传统运输与通信网络,维系着三省边区的物资流通和民生及其与国内外市场的联系。20世纪30年代前后,以公路建设、汽车运输和邮电通讯为主要标志的现代交通与通信才在赣闽粤边区开始兴起(见表1)。而在此之前,边区大部分县城普遍设立了邮政局(邮政代办所)与电报局(电信代办所),经营现代通信业务。^② 边区现代交通与通信的兴起,一来受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浪潮的驱动(以侨乡粤东北之梅县等地表现最为明显),二来应30年代国民

① 参见温锐、游海华著:《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20世纪赣闽粤三边地区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0—53页。

② 参见温锐、游海华著:《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20世纪赣闽粤三边地区实证研究》,同上书,第70页表2—10。

政府“交通剿共”政策之需。^①但是,正是由于边区多年惨烈的国共内战,刚刚启动的通信现代化建设成果几乎全部毁于战火,通信网络一度中断^②;边区内的公路建设虽然随着国民政府军的进占而不断展拓(见表2),尤其是闽西和粤东北形成了自己的公路网,但是,截止到抗日战争前的1936年,赣闽粤三省边区间的省际公路网络并没有形成。

表1 赣闽粤边区各县最早修建公路和汽车
客运营业时间概况表 单位:年

县名	最早 修建公路 时间	公营 汽车出现 时间	民营 汽车出现 时间	县名	最早 修建公路 时间	公营 汽车出现 时间	民营 汽车出现 时间
长汀	1928		1935	会昌		1938	1942
上杭	1932		1936	瑞金	1928	1939	1940
武平	1931	1938	1935	石城	1934		
梅县	1927			宁都	1934		
兴宁	1926		1929	兴国	1933	1935	1945
平远	1930		1930	于都	1933	1936	1945
蕉岭	1933		1933	赣县	1932	1934	1934
寻乌	1933		1936	安远	1933	1943	

资料来源:《长汀县志》1993年版,第276、286页;上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杭县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1、294页;武平县县志

① 参见熊式辉:《宣誓就职答词(1930年12月)》;谭炳训:《十年来之江西公路》,见江西省政府《赣政十年》编委会编:《赣政十年》,1941年印;谢友仁:《旧福建的公路是怎样修建起来的》,见《福建文史资料》第4辑,第37页。

② 例如,1930-1932年间,仅赣东南停办之邮局就计有兴国、瑞金、宁都、会昌、石城、于都等6处,停办之代办所有壬田、横江、陂头、洛口等10多处。参见王孝槐主编:《江西邮政通信简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0页。

编纂委员会编:《武平县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58、268 页;《梅县志》,1994 年版,第 444 页;《兴宁县志》1992 年版,第 307、316 页;平远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平远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46、251 页;《蕉岭县志》1992 年版,第 270、275 页;《寻乌县志》1996 年版,第 153、159 页;会昌县至编纂委员会编:《会昌县志》,新华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30、331 页;《瑞金县志》1993 年版,第 488、494、495 页;石城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石城县志》,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68 页;宁都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宁都县志》(内部版),1986 年印,第 216 页;兴国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兴国县志》(内部版)1988 年印,第 282、291 页;于都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于都县志》,新华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31、336、335 页;《赣县志》1991 年版,第 208、213 页;安远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安远县志》,新华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41、347 页。

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日军的进攻和东南抗日大后方的形成,江南铁路中断、水运失畅,赣闽粤边区内公路运输的地位日益凸显。鉴于此,赣闽粤三省政府相继修建了几条重要的省际公路。1936 年,闽西新泉至上杭县城公路修通,蕉岭县城至武平岩前公路通车,于都县城至本县银坑段公路接通;1937 年,赣县江口至于都县城公路通车,瑞金经会昌至筠门岭公路全线贯通;1939 年,兴国县城至于都银坑公路修通,于都县城至瑞金县城公路通车(见表 2)。至 30 年代末,由于上述几条重要区间公路的修建与贯通,赣闽粤边区建成了“三横两纵”格局的通达公路交通网络。所谓“三横”,一是鹰(潭)界(化陇)线,即由鹰潭经南城、宁都、银坑、兴国、泰和、永阳、永新至界化陇(湘赣交界),这条交通孔道把支离破碎的浙赣、湘桂、粤汉等铁路干线连接起来,往西可经界化陇入湘或经赣县达粤北韶关,东可经鹰潭至江浙或由黎川、光泽、上饶入闽,是东南诸省“到西南各省的交通要冲”。^①二是朋(口)赣(县)线,即由闽西朋口经长汀、瑞金、于都达赣县,这条线往西

① 《江西民国日报》,1940 年 10 月 2 日。

可至粤北韶关或经赣(县)遂(川)泰(和)与鹰界线相接入湘,往东可经永安、南平至福州或经过闽北建阳至鹰潭、上饶等地,也可经龙岩通漳州。每天“可以看见络绎不绝的肩挑苦力与挑着一包包的盐从福建运至江西”,华南各省“大部分将依赖福建的供给”^①,此线上的瑞金益发显示其“闽赣通衢”的地位。三是官(渡)汕(头)线,即由粤北韶关翁源的官渡经过连平、龙川、兴宁、梅县至潮州、汕头,1939年6月潮汕被日军占领前,“江西、湖南、广西以及广东都把它当作比较便捷的出口交通线”。^②所谓“二纵”,一是宁(都)平(远)线,即由宁都经瑞金、会昌、筠门岭、吉潭至平远仁居,这条公路北接鹰界线、朋赣线,南接官汕头线,为粤盐赣米交互运输的主要路线,也是江西钨、锡外运及自香港经汕头进口物资的主要通道,还是重要的军运补给线。^③二是宁(化)梅(县)线,即由闽西宁化经连城、新泉、上杭、岩前、蕉岭至梅县,此线北接朋赣线,南接官汕线,为闽粤交通干道。

表2 30、40年代赣闽粤边区中心各县
公路干线建设概况表 单位:年

	公路线名称	经过的主要交通点	通车年份
闽	武杭线	武平县城-岩前、武平县城-十方-上杭县城	1934
	南瑞线	南平-永安-连城-朋口-长汀-隘岭-瑞金	1935
	漳瑞线	漳州潮水-龙岩-新泉-朋口-长汀-瑞金	1935
西	新杭线	新泉-上杭县城	1936
		南平-顺昌-崇仁-泰宁-建宁;连城-宁化	抗战期间
		南平-建阳-邵武-光泽-江西南城	

① 《江西民国日报》,1939年10月7日。

② 《江西民国日报》,1939年8月1日。

③ 江西省交通厅公路管理局编:《江西公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版,第163页。

公路线名称 经过的主要交通点		通车年份
粤 东 北	兴梅线 梅城- 兴宁, 白渡- 松口	1932
	兴柘线 兴宁- 石正- 大柘- 八尺	1932
	柘大线 大柘- 东石- 仁居- 大畲坳	1932
	梅城- 丙村, 油坑- 新铺	1933
	梅城- 蕉岭, 梅城- 白宫	1934
	梅城- 平远石正	1935
	蕉城- 武平岩前, 梅县- 石扇- 新铺- 平远东石	1936
	丙村- 雁洋	1937
赣 东 南	泰兴线 赣县- 南康- 大庾- 小梅关	1932
	寻乌古潭- 牛挨石- 平远仁居, 安远- 定南	1933
	泰和- 兴国县城段	1934 年底
	城于线 赣县- 遂川, 赣县- 兴国	1935
	城于线 吉潭- 会昌筠门岭, 寻乌城- 吉潭, 瑞金- 宁都	1935
	银坑- 宁都- 广昌- 南丰- 南城	1935
	于都城- 银坑	1936
	赣县- 于都, 瑞金- 会昌- 筠门岭- 吉潭- 牛挨石	1937
	瑞金- 于都, 兴国- 银坑段	1939
安远- 信丰	1943	

资料来源:《武平县志》1993 年版, 第 258 页;《长汀县志》1993 年版, 第 277 页;《上杭县志》1993 年版, 第 282 页;《福建文史资料》第 4 辑, 第 38、42 页;《梅县志》1994 年版, 第 445、446 页;《平远县志》1993 年版, 第 246 页;《蕉岭县志》1992 年版, 第 270 页;《赣县志》1991 年版, 第 208 页;《寻乌县志》1996 年版, 第 153、153 页;《安远县志》1993 年版, 第 341 页;《兴国县志》1988 年印, 第 282 页;《瑞金县志》1993 年版, 第 488 页;《于都县志》1991 年版, 第 331 页;《会昌县志》1993 年版, 第 325 页。

综上所述, 循着边区“三横两纵”的公路网, 东可达江浙; 东南可至福州、厦门、漳州; 南可至潮汕; 西可至赣县、韶关、湖南; 北可至南城、鹰潭。无疑, 赣闽粤边区“三横两纵”的公路交通网络是东南抗战的重要军事补给线, 也是大西南和东南诸省联系的大动脉,

是为当年南部中国的交通中心。尽管这一公路交通网络带有明显的战时特征,但是,它对赣闽粤边区社会经济的影响同样深远。

通信设施的建设也与此相类似。30年代边区大规模的国共内战结束之后,国民政府致力于地方治安和恢复经济建设;邮政局也恢复邮递。至抗战时期,各县县城和主要乡镇,尤其是交通要道乡镇均架设电报线或电话线(县城之间的电话线与电报线一般共线)。赣东南的电报中心宁都局“负责瑞金、长汀、于都、会昌、兴国、泰和等地的转报任务”,可发给南昌和赣县;闽西的电报中心长汀局,“凡发往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等地的电报均由此路发出,又开通直达福州报路”;粤东的蕉岭,“联络地点有梅县、平远、福建省长汀、江西的筠门岭和会昌”,1944年冬,韶关沦陷,广东省电信局迁至兴宁县,兴宁一时成为连接闽、粤、赣三省的转报中心局。^①至此,赣闽粤边区现代通网络初步形成,电话入户也开始少量成为事实。它与前述边区初步形成的公路交网络相结合,为战时赣闽粤三边地区的第一次现代经济产业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赣闽粤边区的第一次现代产业潮

1938年以后,随着赣、闽、粤三省军政机关的相继内迁,沦陷区难民、军政人员、医院、学校、银行、工商企业等纷迁赣闽粤边区;与此同时,为巩固东南地区的抗日后方,坚持抗战救国,三省政府还在边区创办了一批新的现代产业。它们承接了20世纪初边区现代化的启动,在边区现代化进程中卷起了第一次现代经济产业潮。首先,边区的现代工业企业及其生产呈现快速发展之势。19

^① 《宁都县志》1986年印,第232页;《长汀县志》1993年版,第303页;《蕉岭县志》1992年版,第285页;《兴宁县志》1992年版,327页。

世纪末,在个别行业,粤东北梅、兴等县已经出现了几家近代工业企业。但是,严格说来,边区的工业化进程真正开始于 20 世纪初期。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由于政府的提倡和努力,民间人士的积极参与,赣闽粤边区各县创办了一些以纺织、印刷、电力为主的现代工业企业;其中,粤东北的梅县、兴宁走在前头。^① 不过,由于多方面条件的制约,近代工业的发展仅处于启动或萌芽阶段,尤其是历经 30 年代激烈的国共内战后,闽西和赣南刚启动的现代工业不仅没有发展,而且受到严重影响而趋于衰落。曾任江西建设厅长的张泽尧说,1931 年以前,“本省实无大工业,更不足以语重工业。所有各项轻工业,不啻手工业而已”。^② 江西全省工业状况如此,赣南工业则尤为落后。苏区革命后,赴宁都调查社会状况的政府人员说:“该县工业,极不发达,除少数之手工业,以织夏布,此外实无一工业可言。”^③ 30 年代末期的上杭县,也“无实业之可言”,“全县无一大工场,无一大制造厂,所有出品皆用手工制造,无有用机器者”。^④ 宁都、上杭如此,闽西和赣东南可见一斑。

抗战爆发后,出于经济建设和解决军需民食、物资短缺的需要,退居边区的后方政府对现代工业企业在政策上给予大力扶持,同时利用市场的引导与刺激,边区创办了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工业企业;另外,当时各沦陷区也内迁了不少工厂到边区安家落户。这些现代工业企业采用当时最为先进的工业机器、生产工艺和管理模式。因此,至 40 年代前半期,赣闽粤边区各县可谓工厂林立,一派兴旺。

① 参见温锐、游海华著:《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20 世纪赣闽粤三边地区实证研究》,第 228 页表 3-15。

② 张泽尧:《十年来之江西工业》,见《赣政十年》1941 年印。

③ 《江西民国日报》,1934 年 12 月 10 日。

④ 民国《上杭县志·实业志》,1938 年版。

1938年以后的赣南,其工业可说是盛况空前。据记载,赣南工业中心赣县,抗战时期,经常有工人10人以上之工厂,共计67家,职员235人,工人3836人;1941年,赣县全县工厂达54家,工人3978人,赣县成为全国14个重要经济城市之一。^①抗战后迁来赣县的印刷厂就有私营的印记、鼎记等7家,公营的民生印刷第二厂、新赣南印刷厂等4家,上海迁来的专印钞票的大东书局、专翻印铅版的商务印书馆,共计13家印刷厂和1家制铅锌版和凹凸版的企业。^②1943-1944年,赣东南各县经江西省政府建设厅登记的工厂计有29家,经济部登记的赣东南各县工厂计有49家。^③其他如瑞金、石城、会昌、寻乌、安远等县也创办了印刷、纺织、粮食加工等一些轻工企业。尽管上述资料不同,统计数据有差异,但都反映了抗战时期赣南工业中心赣县和赣东南各县工业的空前盛况。

闽西工业比战前有了新的发展。闽西工业中心长汀县,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建立了一批近代工业,可惜大部毁于30年代国共内战的战火。抗战爆发后,一些福建沿海的工厂先后迁入长汀;同时,长汀创办了一些工业企业;另外,在“东南工合”指导扶持下,也成立了一批工业。例如,1939年,“工合”长汀事物所建立“汀州城区机械社”,生产切面机、火锅、熨斗等;“工合”于城区成立4个纺织合作社,机织土布供不应求;1939-1945年间,“工合”长汀事物所组建合作社50多个,就业人数几千人;1943年,湖北汉阳兵工厂1000多人内迁长汀河田镇设厂,同年,长汀商人兴办新华米

① 《力行日报》,1946年5月4日;《赣县志》1991年版,第177页。

② 《赣南民国日报》,1941年8月4日。

③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江西近代工矿史资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根据第78-86页表统计而来。

厂和大同、民生、春光碾米厂；1944 年，官商合办的“长汀县光明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①；另外，化工、冶炼、印刷、服装、粮食加工等工业企业也相继创办，工业门类渐趋齐全。期间，上杭和武平县也创办了几家工业。1939 年，上杭商家合办“丰记布庄”，为木机织布企业；同年，武平县城创立“开文印务局”，1945 年，此局迁上杭；由地方乡财投资兴办的“上杭复兴书店”，从梅县买来两台旧机器，承印《上杭精诚报》，兼印表格。^②

粤东北的兴、梅等县得地利之先，承接了 19 世纪末以来工业化发展的基础，又较少受到 30 年代边区国共战火伤害，现代工业在三边地区遥遥领先。抗战时期，梅县工业呈膨胀式增长，计有卷烟厂 10 多家，从业人员 3000 多人；火力发电厂 4 家；私营机械修理厂 14 家；纺织厂 13 家；碾米厂 7 家；印刷业 20 家；玻璃厂 7 家；其中机器修理、纺织、印刷、碾米、卷烟等行业多采用机械化生产。^③ 卷烟业最为兴盛，它兴起于 30 年代末，是抗战时期梅县的支柱产业。抗战期间，梅县先后成立民生、海源、复兴等十几家烟厂。各厂职工人数多达几百人，少的也有百人以上；产量也从每天的几万支增至几十万支；设备从手工制作发展为机器制造，各厂先后生产的香烟牌号共达百余种；产品远销江西、湖南、福建、广西等省。例如，1938 年成立的海源烟厂最盛时职工人数达 400 多人，产量每天达 50 多万支，还在兴宁县、广州市另设了分厂；复兴烟厂创设于 1940 年，职工最多时达二三百人，抗战胜利后曾在汕头租

① 《长汀县志》1993 年版，第 219、212 页；政协长汀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长汀文史资料》第 26 集，第 66—67 页。

② 《上杭县志》1993 年版，第 240 页；《上杭文史资料》总第 5 期，第 41 页。

③ 《梅县志·工业》，1994 年版。

赁华资烟厂进行生产。^①

兴宁、梅县工业以纺织业为龙头。“兴宁织造很发达”，“兴宁、梅县的布很好”；1928年起，兴宁、梅县的洋纱布就完全抢了赣州在寻乌市场的生意。^②抗战爆发后，兴宁布业再展辉煌业绩。全县织造棉纱成品的工厂大小不下800多所，专门织布匹家庭有3万余户，几乎是家家纺纱织布；规模大者，拥有铁机、木机500—600架，小者，亦有10—20架。乡间更有“无机不成家”之谚！兴宁城郊的草地，几乎全为晒布的场所。纺织产品精良，“实可架舶来品之上”；销路广泛，“操纵了半个中国各市场布业的牛耳”。^③据1935—1953年的不完全统计：兴宁织布人数达20多万人，年产“细布”就达150万匹。^④在以布业为中心的纺织业的带动下，其他“袜业、毛巾以及笔、墨、鞋、五金制造、化妆品、肥皂、成衣等，均有大量生产”。^⑤

其次，边区的公路运输业和邮电通信业初步兴起。由于前述现代公路交通网、邮电通讯网的初步形成和交通站点、邮政局、电报局的普遍设立，赣闽粤边区的汽车运输业和现代通信业蓬勃而起，官营、私营或官商合营的汽车公司纷纷成立。30年代中期以后，闽西长汀有龙连汀汽车公司，上杭有民兴公司，武平有民行汽车公司、福华转运栈等；抗战期间的筠门岭，除官营外，还有“致

① 政协梅县文史委员会编：《梅县文史资料》，第19期，第150—151页；中共梅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1999年版，第398页。

② 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5），见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1、55页。

③ 《正气日报》，1942年10月22日。

④ “细布”面宽1尺1寸，大布面宽约2尺；十尺细布为1丈。见《梅州文史》第3辑，第117页。

⑤ 《正气日报》，1942年10月22日。

远”、“大昌”、“建华”等商营汽车运输公司；瑞金则有“赣闽粤行”、“晋昌行”、“保安行”、“城关区职工运输行”等 4 家汽车运输商行；相形之下，粤东北的汽车运输业更为兴盛，平远县有 6 个行车公司，梅县先后营运的行车公司有 12 家，蕉岭有 4 家。^① 随着汽车运输公司的成立，各公司纷纷购买“雪佛兰”、“道奇”、“福特”等牌号汽车从事客货运输业务，边区的现代运输业蔚然兴起。1938—1939 年的官汕公路上，每日行驶的汽车从四五十辆增至二三百辆；40 年代初，兴宁的客货汽车共有 320 多辆，名列广东省第二，1945 年还增至 500 余辆；赣东南的筠门岭经吉潭至梅县的公路上，“每天有一、两百辆车子来回跑”；小小寻乌县吉潭圩的“新兴公司”，拥有汽车六七部，带动邻近澄江的十几部车子跟着跑业务。由于汽车运输一度居于垄断地位，在上述两条公路上，都曾经发生过汽车运输排挤肩挑劳动力现象。^② 粤东北梅县公路建设发达，城乡公路交错纵横，各线班车来往班次少的有 4 次，多的达 20 余次。^③

邮政、电话、电报等现代通讯方式也进入并较多地应用于边区社会经济生活中，并对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抗战时期创办的大量现代杂志报刊一般都通过邮政局发行和邮寄；而在赣东南的筠门岭镇，则可以收到来自国内外的信件。^④ 人们通过邮政局，可以

① 《长汀县志》1993 年版，第 286 页；《上杭县志》1993 年版，第 294 页；《武平县志》1993 年版，第 268 页；《正气日报》，1944 年 1 月 17 日；《瑞金县志》1993 年版，第 495 页；《平远县志》1993 年版，第 251 页；《梅县文史资料》第 28 辑，第 92 页；《蕉岭县志》1992 年版，第 269 页。

② 《江西民国日报》，1939 年 8 月 1 日；《兴宁县志》1992 年版，第 316 页；1999 年寻乌县实地调查。

③ 《梅县志》1994 年版，第 456 页。

④ 1998 年会昌县筠门岭镇实地调查。

不断了解外界的各种信息。相对邮政业而言,电讯业的信息传播更为快捷,因而除了军政机关广泛采用外,它也频繁应用于各种商业经营。抗战时期,寻乌吉潭潘作醴家装有一部电话,通平远、梅县,主要用于做米粮等商品贸易,从而对边区商品贸易的信息有较及时的掌握。^①抗战期间的瑞金,布匹、百货价格涨跌频繁,套购倾销之风大盛,电报因而成为各大商户商场出奇制胜的“黑武器”。裕兴祥商号利用电报传递商讯时以“烟纸豆”代“金、银、锡泊”。徐恒太得到丰城土布涨价消息,即向广东帮的福兴昌、杨和茂等商号购进兴宁棉布,甚至雇人抢购;当获得跌价消息时,则四出招揽,兜售倾销。^②兴宁的无线电台,则多为商人使用。^③市场波动与现代通信,为各大客户带来各种新的商机。

再次,文化教育、金融、旅栈饮食等服务业也在战时的特定环境中呈现初步繁荣之象。抗战时期,据不完全统计,赣闽粤边区16县区内迁大中专院校68所、银行89家,新创办报纸56种(见表3)。其中,安远县历史上第一次拥有了现代师范学校,寻乌、石城、于都、安远4县第一次创办现代新闻报刊,兴宁、平远、蕉岭、寻乌、安远5县第一次出现银行这一现代金融机构;并且民国时期安远县仅有的4种报纸,兴宁、会昌、瑞金3县的15所学校全部兴办或内迁于抗战时期;民国时期,梅县、赣县、瑞金绝大部分银行也是内迁或建立于抗战期间。长汀、梅县、赣县三地因是赣闽粤边区的中心城市,内迁的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和大中专学校众多,还兴办了23种杂志或刊物。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闽西的汀、杭和粤东北的兴、梅4县还开办了现代保险业务,均由当地银行代办。

① 1999年寻乌县实地调查。

② 瑞金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编:《瑞金县工商行政管理志(1988)》,第179页。

③ 《兴宁县志》1992年版,第327页。

表 3 抗战时期赣闽粤边区各县内迁和新创办的
报刊、院校、金融机构数量概况表 单位:种;所;家^①

	报纸	其他刊物	大中专院校	银行	保险机构
长汀	5	10	8	9	3*
上杭	3		2	5	3*
武平	1			2	
梅县	5	5	13	17/ 18	2*
兴宁	11		7#	8*	1*
平远	1		1	3*	
蕉岭	6		2	9*	
寻乌	1*			2*	
会昌	1		4#	4	
瑞金	3		4#	6/ 7	
石城	1*		1	1	
宁都	5		7	5	
兴国	4		3	2	
于都	1*		8	2	
赣县	4	8	7	12/ 14	
安远	4#		1*	1*	
合计	26	23	68	89	9

资料来源:《长汀县志》1993 年版,第 748- 749、736- 737、696- 699、711- 712、480- 482 页;《上杭县志》1993 年版,第 760、709、464 页;《武平县志》1993 年版,第 661、340 页;《梅县志》1994 年版,第 950- 953、866- 869、873、539- 540、599 页;《梅州文史》第 7 辑,第 85 页;《兴宁县志》1992 年版,第

① 注:1、表中数据仅据县志所载内容统计;2、标* 号的数据表明该栏产业为第一次出现,标# 号的数据栏表明民国时期该栏产业全部为抗战时期创办,符号/ 前数据为抗战时期数据,符号/ 后数据为整个民国时期数据;3、复刊的报纸、复办的院校作新办计算;4、大中专院校包括各类职业学校;5、同一银行的分支机构(办事处)分别计算。

716、650、652、674、419、433 页;《平远县志》1993 年版,第 573、519、324- 325 页;《蕉岭县志》1992 年版,第 575- 576、537、370 页;《寻乌县志》1996 年版,第 366、199 页;《会昌县志》1993 年版,第 435、407、367 页;《瑞金县志》1993 年版,第 684、653- 655、605 页;《石城县志》1989 年版,第 445、417、331 页;《宁都县志》1986 年印,第 262、403、426、445 页;《兴国县志》1988 年印,第 601、623、624、436 页;《于都县志》1991 年版,第 519、471- 473、413 页;《赣县志》1991 年版,第 548、549、471- 472、303 页;《安远县志》1993 年版,第 567、531、454 页。

这一时期,赣闽粤地区内迁的报纸有原在广州出版的《中山日报》与《大光报》、原在韶关的《中国报》、原在汕头的《汕报》、原在南昌的《江西民国日报》和《力行报》,也有由当地党政部门、社会团体和私人创办的报纸如长汀的《汀江日报》与《中南日报》、梅县的《劲报》和《梅县日日新闻》、赣县的《正气日报》与兴国的《盟友西报》等。新设立的银行既有“四行二局”(国家级)的办事处,也有福建省银行、广东省银行、江西实业等省办银行的分支机构,私营银行如江西裕民银行和县立银行等也陆续开办。内迁的著名大中专院校有国立中正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前身)、国立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中正医学院、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勤商学院、私立广州大学、江西兽医专科学校、江西省立南昌高级商业职业学校(江西财经大学前身)、省立南昌工专学校、省立福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等等。

为满足现代产业发展的需要,培养专门人才的职业技术学校纷纷创办。例如,1938 年,长汀商业补习学校、县立工业职业学校、农业职业学校相继成立;抗战期间上杭县成立“私立上杭力行农校”。40 年代初期,兴宁县先后创立省立兴宁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县立高级助产职业学校;梅县则创办了多家会计学校和县立高级助产学校;此外,梅县平民医院还附设“私立平民护士学校”、黄塘德济医院附设“私立德济护产学校”。1941 年以后,赣县创办了多家职业学校,有省立赣县高级助产学校、私立东南高级商业学

校、高级农业职业学校、私立新中国职业学校、南华工业职业学校、章贡初级农业职业学校等；1941 年秋，会昌筠门岭新华初级商业学校成立；40 年代初，瑞金县相继创办私立建成森林职业中学和可大应化初级职业学校等等。上述职业技术学校创办的时间有长有短，招收的学生有多有少，开设的课程有工有农、有商有医，创办人有政府有商会有私人，都是立足于抗战建国和为边区经济发展培养适时性专业人才。

另外，随着战时三边地区人流、物流的涌动，来往驻足人员的增多，城镇旅栈与饮食业也有了新的发展。江西省建设厅先后在赣州、宁都、南城、光泽等九地创办陶陶招待所，采用现代旅店管理方法，受到各界人士的好评。^① 边区转运重镇筠门岭，旅栈业从抗战前的 20 余家发展到 80 余家；其中，岭梅旅社拥有高雅床位 20 余铺，大众宿舍每晚可住旅客 300 余人。^② 抗战时期的梅县城有旅栈业 34 家，长汀县有 60 家。^③ 饮食业也兴盛一时，40 年代前期的会昌开设的铺子以吃食为最多；瑞金县城的消遣场所，主要是酒店，县城每 100 家铺子中就有 60 家酒店；宁都则流行露天茶社，大街小巷、空坪草地都摆起桌椅卖茶。^④ 粤东北的梅城，抗战前有 20 多家席馆酒楼；抗战爆发后，广州、汕头迁来不少较有名气的酒楼茶馆；一些酒楼茶馆还到省港等地聘请一批“女招待”来招徕顾客，梅州宾馆、月宫酒家、安东食堂、东湖旅社还附设舞厅。^⑤ 此外，边区城镇的电影放映业、照像业、律师事务所等一些新兴服务产业也

① 罗自强：《记抗战时期的江西建设厅长杨綽庵》，见《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 20 辑。

② 《会昌县志》1993 年版，第 304 页。

③ 《梅县志》1994 年版，第 534 页；《长汀县志》1993 年版，第 341 页。

④ 《江西民国日报》，1945 年 5 月 4 日；《力行日报》，1946 年 9 月 13 日；《知行报》，1945 年 8 月 11 日。

⑤ 杨汾：《抗战前后梅城的饮食行业》，见《梅县文史资料》第 25 辑。

有所发展。这些新兴的社会、经济服务产业呈现的初步繁荣,与前述边区工业企业的崛起和新兴工业生产的发展、运输通讯产业的兴起共同构成的边区现代经济产业潮,是当年三边地区第一次现代化浪潮的主要标致——尽管它是战时特定环境的产物。

三 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初步转型

20 世纪上半叶的民国边区地方政府,延续了清末“新政”以来的政府管理职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大势,在政府机构设置、管理职能和社会公共产品的提供、乡村社会的管治理等方面进行部分的调整与改革,以适应战时边区经济产业潮的兴起。抗战后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政府管理职能与之适应与实现缓慢转变的趋势,战时的赣闽粤三边地区的瑞金、长汀、梅县等县地方政府管理职能的变化可以得到引证。

第一,基层行政组织分工愈来愈细,不少专门的行政机构独立出来,政府管理职能行业化和专业化特征日益明显。首先,财税机构进一步的分设。瑞金是赣东南的重要进出口关卡,民国以来,税务机构设立繁多。1939 年,设江西省战时卷烟管理局瑞金查验所;1941 年,设财政部湘赣区税务管理局赣南分区税务管理所瑞金分所,专办统税、印花税、矿产税、烟酒税稽征;同年,设立财政部缉私署瑞金缉私所;财政部江西省税务局瑞金税务员办事处。1942 年直、货两税机构分开,瑞金又分别设立相应的分局(所);1944 年,设财政部盐务局瑞金分局,专司盐税与食盐缉私;1945 年,设立上饶海关税务司公署瑞金支关。闽西长汀县,1940 年设货物税分局,1943 年设直接税局。粤东的梅县,1940 年设立广东省财政厅梅县税务局(直接税局)、财政部广东印花烟酒局梅州稽

征分所(后改为货物税局)。^① 抗战时期,财税机构进一步分开;税务征收,也往往按照税收种类或税收的性质设立专门的征收机构。其次,县政府还设立了其他许多新的专门的管理部门或机构。例如,1937年,适应抗战的需要,瑞、汀、梅三县先后设立兵役科,负责征兵、组训、保安等事情;40年代,上述三县又相继设立统计室或统计科,办理统计事宜等。^② 这表明,抗战时期,政府管理职能行业化和专业化特征愈来愈明确。

第二,政府增设了不少新的经济管理与服务机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更加突出。19世纪末期以来,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推动下,边区传统产业不断扩张,现代产业相继崛起,商品经济和市镇也呈现一定程度的繁兴。与此变化相适应,战时边区也增设了一些新的农工商经济管理与服务机构,经济的宏观调控与管理逐渐成为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

在农业方面,为了推动传统农业的革新,边区地方政府成立了以良种推广为主的管理机构,从事农业指导与服务工作。例如,1936年,长汀县建立苗圃;1943年更名为县农场,其工作主要是培育良种、试种农林新品种等;1940—1941年间,梅县县府设立农业工作站;1941年又设立垦荒指导员,各区、乡、保设立垦荒会,鼓励与推行垦荒垦植。^③ 工商业方面,抗战以前,边区各县县府均设立建设科,全权管理工商业事宜;抗战期间,各县又先后增设了其他一些工商业管理与服务机构。1939年,瑞、汀两县分别成立中国

① 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瑞金县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97页;长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汀县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469页;梅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梅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38页。

② 《瑞金县志》1993年版,第310、638页;《长汀县志》1993年版,第661、563页;《梅县志》1994年版,第835、600页。

③ 《长汀县志》1993年版,第714页;《梅县志》1994年版,第238、250页。

工业合作协会东南区瑞金事务所、长汀事务所，以贷款协助各县工业合作社的成立并指导其工作。^① 1940年，长汀县先后成立联合购销处和公沽局，前者主管纸品外销，后者掌管全县粮食的收购、配销、运输、保管；1938年，长汀县成立物资管理处、限价委员会；1940年，梅县成立“非常时期梅县物价平价委员会”；上述委员会会同商会和同业公会等，管理市场物价。^② 在基础设施管理方面，随着战时公路交通的发展，新设了交通管理机构。1940年，江西省公路处瑞金工务段成立，下设7个工区，负责公路养护、渡口管理事宜；翌年，瑞金县设立交通管理站，与县警察局共同行使交通安全管理职权。^③ 1941年，福建省建设厅在长汀县设立交通管理站，办理行车登记，收取养路费；公路养护则由漳龙汀工程处负责。^④ 1939年，广东省建设厅在梅县设立县工务总段；此外，梅县还成立了交通安全监督站，负责考核司机，征收养路费。^⑤

第三，为社会提供现代新型的民众文化教育、卫生服务和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开始纳入政府行政的职能范围。自清末新政至30年代前期，边区虽已普遍设立了各类现代基础教育，但在成人民众教育方面几无起步。随着赣闽粤三省政治经济中心向三边的转移，三边地区的成人民众教育有了长足发展。同时，社会公益管理事业也得到了展拓。文化教育方面，各县都建立了民众教育馆、公共体育场等场所，对民众进行教育和服务。例如，1935年和1937年，瑞金县相继建立民众教育馆和公共体育场；1939年和

① 民国《瑞金县志》1941年印，第125页；民国《长汀县志·实业志》1940版。

② 《长汀县志》1993年版，第334、383、413页；《梅县志》1994年版，第601页。

③ 《瑞金县志》1993年版，第493、500页。

④ 《长汀县志》1993年版，第290、293页。

⑤ 《梅县志》1994年版，第443、466页。

1942 年,长汀县建立了公共体育场和开办省立民众教育馆。^① 另外,边区地方政府还成立了不少县立职业技术学校,为本地经济的发展培养适时性人才(见前文阐述)。在卫生方面,1936 年,瑞金县诊疗所成立;1938 年,长汀县卫生院成立;同年,梅县成立卫生事务所。^② 卫生院(所)等现代官办医疗机构的设立,表明民国政府在致力于社会公共事业的建设上,已超越了传统政府的职能。社会保障方面,主要是从事救济工作。战时边区各县均设立各种救济机构,对丧失生活来源的难民进行救济,并作好妥善安置。例如,民国期间,梅县县政府先后成立了难民救济会、赈济委员会、冬季救济委员会等对灾民进行施衣、施粥等救济。^③ 1934—1938 年,平远县县长林公顿的主要政绩之一就是社会保障事业作为政府的重要事情来办,他在全县 160 多个保中,设立了“义仓”,为贫民百姓备荒。^④

第四,政府管理职能逐渐由县城向乡村基层延伸。经 30 年代激烈的国共内战,国民政府在恢复对三边统治之后,三边各县开始陆续推行以保甲制为基础的“新县制”,至抗战军兴,国民政府对三边地区统治进一步加强,新县制在三边各县全面推行,在新县制中,县以下行政组织以保甲为基础,设区、乡(联保)、保、甲 4 级组织;区设区分所,并设民团,区内设乡(联保),置乡公所,有编制若干。例如 40 年代寻乌各乡镇公所的人员编制总数曾一度达 120 人,后缩编为 86 人^⑤;民国寻乌乡镇一直稳定在十六、七个建制左

① 《瑞金县志》1993 年版,第 676、745 页;《长汀县志》1993 年版,第 422、737 页。

② 民国《瑞金县志》1941 年印,第 97 页;《长汀县志》1993 年版,第 774 页;《梅县志》1994 年版,第 970 页。

③ 《梅县志》1994 年版,第 812、814 页。

④ 政协平远县文史编委会编:《平远文史》第 9 辑,第 85 页。

⑤ 寻乌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寻乌县志》,新华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74 页。

右,表明每一个乡镇一般都有5-8个行政人员。1942年,蕉岭县的乡镇公所编制为8人,各保也设编制,为4人,其中保长1人,副保长1人,干事2人,民政、警卫、经济干事由副保长及国民学校教员兼任。^①有编制者,都纳入县财政开支。这表明,“新县制”推行以后,国民政府在强化对边区基层社会的严厉控制的同时,基层政权建设与清政府相比,无疑也得到了有力的加强,其政府的机构至少已经深入乡镇一级,有的已经到达行政村这一级了。同时,其他行政机构的设置也纷纷下延。例如警察机构,1945-1948年,瑞金县警察局在壬田、瑞林、九堡、武阳设立了4个区乡警察所(分局)。^②再如电信机构,苏区革命后,瑞金县邮电局在武阳(1939年改为临时邮局)、壬田、九堡、万田、黄柏、石门、油岗、大柏岭等地还设有8个代办所,电报局也在武阳设立了收发处;1940年,长汀增设新桥、童坊、馆前、濯田、水口等乡邮政代办所及4个信柜;抗战时期,除县城外,梅县还有松口、丙村、畚坑、隆文4个邮政局,全县邮政代办所43处,信柜26处。^③卫生和教育机构也向乡村基层延伸。1940年,长汀县新桥、河田、古城、濯田继县城设卫生院后均设分院;到1946年,梅县共有区卫生院1所,乡镇卫生所4所。^④“新县制”推行以后,边区各县的乡(镇)中心小学和保国民学校普遍建立,各学校办学经费均享受国民政府财政资助。上述内容既说明了边区政府对社会统治的加强,也体现了边区政府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增强。

就战时的边区社会而言,不管是政府机构设置的专业化与行

① 蕉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蕉岭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27页。

② 《瑞金县志》1993年版,第241页。

③ 民国《瑞金县志》1941年印,第119、120页;《长汀县志》1993年版,第297页;《梅县志》1994年版,第443页。

④ 《长汀县志》1993年版,第774页;《梅县志》1994年版,第974页。

业化趋势,还是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加强、社会公共产品提供的增加及其社会统治能力的下延,都或多或少体现了战时边区政府在中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顺应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某些趋势。

四 民众国家政治与民族意识的强化

随着政府管理机构的增设和下延及其专业化管理职能的强化,边区战时地方政府整合社会和组织民众的能力大为提高;战时边区现代新闻出版、大中专院校等文教事业的出现与膨胀性发展,现代公路交通和通信网络的建成,也为地方政府整合边区提供了条件;加上当时边区与全国一样形成的国共统一战线大环境,国共两党为抗战建国共同做出的努力及中国共产党人对执政的国民党专制统治所形成的制约等因素,从而把长期处于国家政治与社会经济边缘化的三边地区,快捷地引导并纳入国家民族“抗日救亡”的时代洪流之中,使历经东南抗日战火洗礼和激荡的边区民众,其国家与民族观念日益增强,并迅速上升为“抗日救亡”的时代主流意识。

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成立,民众的组织与动员广泛而深入,是当年边区民众国家政治与民族意识强化的重要标致。“在闽西,在潮梅,先后成立与组织了‘随军工作队’、‘下乡工作队’、‘区乡的民众抗敌服务团’、‘青年战时服务团’、‘流亡宣传团’等等”;“全岭东的青抗会员约有一万多人”,“梅县中等学校的学抗会有五六千人”。^① 据有关资料统计,抗战期间仅福建全省为抗日

^① 福建省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闽粤赣边区革命历史档案汇编(1937.9-1939.7)》,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3辑,第207、351页。

救亡奔走呼号的戏剧团体就有 200 余个。^① 这些各种各样的抗日救亡团体,从其团体的社会属性看,有“学抗会”、“青抗会”、“妇抗会”、“商抗会”等等组织。其中,既有共产党领导的团体如“岭东各地青年抗敌同志会”,也有国民党领导的团体如各地“抗敌后援会”。一些大的抗日救亡团体如江西省乡村抗战宣传巡回工作团、蕉岭县“东区服务队”、福建省教育厅的“战时民众教育巡回施教团”,还举办各种形式的干训班,协助当地组建抗宣团队,培训抗宣人员等。^② 边区民众组织,虽然其规模难与苏区革命时代相比,但其普及各个阶层所具有的广泛性特点则是空前的。

在各色抗日救亡团体的宣传鼓动和组织下,面向民众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深入城乡,是战时民众动员程度的另一个标尺。1938 年,梅县一千多高中学生下乡开展救亡运动,在乡村“建立了二百多个夜校,吸引了整千整万的青年农工劳动妇女读书”;他们“深入到每个角落去开展救亡工作……并推动和帮助乡村的战时教育,建立经常的宣传教育工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救亡团体通常都把抗日救亡宣传和社会生产实践结合起来,如动员学生教员帮助抗属春耕,领导群众筑坡开圳,号召儿童收拾肥料等;以上方式在闽西的永定、龙岩和粤东的潮梅、大埔等地均取得了很好的成绩。^③ 抗日救亡团体采取了灵活多样方式进行宣传,例如选择圩日演唱《大刀进行曲》等抗战歌曲,表演《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并散发抗日宣传品;会同当地党政文教各界,联合发起召开抗战形

① 参见邱文生主编:《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9 页。

② 参见吴识论:《追忆江西省乡村抗战宣传巡回工作团》,《江西文史资料选辑》总第 17 辑;赖一璜:《东区服务队在蕉岭》,《梅州文史·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专辑》第 9 辑;邱文生主编:《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9 页。

③ 《闽粤赣边区革命历史档案汇编(1937. 9- 1939. 7)》,第 3 辑,第 203、360- 361 页。

势报告会、座谈会,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在城乡绘制抗战标语和墙头漫画;发动群众抵制日货,慰劳前方将士;开展多种形式的义卖、义演、义劳、义展、义捐活动,为抗战救国募集资金和物资;创办各种报刊杂志,宣传抗日救国观念,如福建长汀国立厦门大学战时后方服务团主编的《唯力》、连城福建省抗敌后援会主编的《战地通讯》、南昌吉安生活书店出版的《教战月刊》、梅县南华学院学生自治会主编的《南大期刊》等等,这些杂志面向社会各界发行,都以抗战救亡为宣传主题。经过广泛而深入的抗宣活动,边区“穷乡僻壤的农村,也荡漾着救亡歌曲的余响和抗敌的标语了”;“各地的慰劳军队、优待抗属、扩大春耕(闽西南最好),特别是一元还债、募捐和义卖运动(梅县、兴宁、龙岩)已经成为真正广泛的群众运动,深入到各阶层和穷乡僻壤中”;“大大地把农村间民众的抗敌情绪与民族意识提高了”。^①

战时组织与动员起来的边区民众,抗战救国中的实际行动则是其国家民族意识强化的关键指标。战时的边区民众,纷纷参战支前,以实际行动表达了自己抗日救亡的热情和保家卫国的决心。众多边区青壮劳力踊跃参军入伍,奔赴前线打击侵略者。据有关资料显示,八年抗战中,江西应征入伍的兵员共 103.7 万人,占国统区动员应征人数的 7.5%;而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赣闽粤边区从军人数至少在 10 万以上,梅县一县就近 2 万人。^②更多的青壮劳力则把保家卫国的热情投入到后方军需服务当中。例如,1943 年夏,第十二集团军决定将一大批武器弹药从定南县迁

① 《闽粤赣边区革命历史档案汇编(1937.9-1939.7)》,第 3 辑,第 208、352、207 页。

② 黄鸣九:《抗战前后国民党政府在江西的征兵兵况》,见《江西文史资料选辑》总第 17 辑;拙著:《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20 世纪赣闽粤三边地区实证研究》,第 114、105 页。

入安远县的鹤仔乡，鹤仔乡等地群众每天投工 200 多人，义务搬运武器弹药近半年；1944 年，在江西大庾修建新城国际机场，赣南各县群众积极参加，单每天出工的民工就有几万人；赣州东南工合机器厂的全厂工人，齐心协力日夜锻造道丁，为修建机场出工出力。^① 捐献资金与物资，是边区民众爱国献金的集中体现。抗战初期，梅县人民共捐献国币 1.14 万元；蕉岭中学师生成立的“战时后方服务团”，1938 年底，募制棉衣 20 件、慰劳袋 250 只（每袋内有万金油、八卦丹、毛巾各一），1939 年初，又募得国币 666 元。^② 1939 年，在闽粤边区的“一元还债运动”中，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团体就募得国币约 5 万元。^③ 抗战期间的安远县，几乎每年都要进行募捐慰劳活动，仅 1944 年濂江乡富家认购义卖春联达 382 对，募集法币 7640 元；1945 年，安远县募集鞋共计 3594 双、袜 1250 双。^④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是广大边区民众实际行动的生动写照。

自古就局限于传统家庭生活与农活劳作的客家妇女，发扬苏区革命妇女的光荣传统，成为边区抗日救亡运动中一支生力军，则是战时边区民众国家政治与民族意识增强的重要体现。全面抗战爆发以后，边区各县相继成立“妇女抗敌后援会”等组织，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许多妇女逐渐走出厨房、走出家庭，活跃在抗日宣传的舞台上。兴宁和瑞金妇女代表队，都曾携带慰问品，奔赴潮汕前线，慰劳抗日将士；抗战中的赣县，各乡均设立妇女队，凡年在 18—40 岁的妇女每日参加训练两小时；梅县东山中学的女友会，

① 政协江西省安远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安远文史》第 7 辑，第 26 页；徐浩然：《记新城国际机场的兴建与毁灭》，见《江西文史资料选辑》总第 17 辑。

② 《梅县志》1994 年版，第 735 页；《梅州文史》，第 9 辑，第 191 页。

③ 《闽粤赣边区革命历史档案汇编（1937.9—1939.7）》，第 3 辑，第 358—359 页。

④ 《安远文史》第 7 辑，第 25—26 页。

利用暑期举办军事训练班和救护训练班,使学员掌握一定的军事和医护知识;蕉岭“东区服务队”曾经召开一次“三八妇女节”纪念会,与会妇女达 3000 多人;粤东各县则通过妇抗会、妇女会、妇女夜校等团体,组织起了数万的知识妇女和农村妇女。^①赣闽粤边区是我国客家聚集地,客家妇女以吃苦耐劳而著称,抗战中,大批劳力参军参战,边区妇女勇敢地承担起大部分生产劳动和社会劳动。闽西的军需运输,“大部分是妇女出来充任”;福建输往粤赣等省的食盐,“大部分利用人工运输”,其中“妇女占 90% 以上”。因此,在闽西通往粤东北和赣南的各条交通线上,“每天有成千成万的妇女,成群的搬运盐”,“不停地帮助政府的运输工作”。^②赣南妇女同样如此。据当时记者估计,赣南“各工厂中,妇女至少要占职工人数总数的 40% 以上”,“她们自己所作的工作,已经由需学习的阶段变成了得力的技术人员”;因此,该记者评价说:“在新赣南的建设事业中,如果有人问我,那些人出了更多的劳力与汗水?我的回答是新赣南的妇女们。”^③

当然,无论是边区民众组织动员、参军入伍、服务抗战后方、捐献资金与物资,还是边区妇女“抗日救亡”活动的不甘后人,尽管这里面无疑也有边区政府的强制性义务,但是,边区民众抗日救亡的热情和保家卫国的决心及其实实在在的行动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正如当时报刊所评论:“在百姓确乎实践了抗战的口号,‘男人

① 兴宁县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兴宁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628 页;《瑞金县志》1993 年版,第 214 页;赣县纂编纂委员会编:《赣县志》,新华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52 页;《梅州文史》第 9 辑,第 187、191 页;《闽粤赣边区革命历史档案汇编(1937.9-1939.7)》,第 3 辑,第 351 页。

② 《正气日报》,1944 年 4 月 24 日。

③ 《正气日报》,1944 年 6 月 3 日。

去当兵,儿童上学堂,妇女耕田地,老人看家乡’。”^①在这里,边区民众普遍的组织动员和深受国家政治与民族意识的强烈振憾则应该是无疑的。它是战时赣闽粤三边地区广大民众在边区第一次现代化浪潮中的政治回应和政治参与流,并与当年边区的交通通讯建设、经济产业潮和边区政府管理职能的初步转型等内容融洽于一体,汇合成三四十年代边区社会的第一次现代化浪潮。

(作者温锐,1953年生,江西财经大学教授;
游海华,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李仲明)

① 《正气日报》,1944年6月3日。